

西游记（下）

推陈出新 呵护经典

王建华

《西游记》，这部享誉海内外的传世经典；花果山，这座迷人、芬芳、引人遐想的胜地，都是连云港最宝贵的文化资源与文化品牌。多年来，《西游记》文化不仅推动了连云港的旅游事业，更为连云港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未来，连云港也必将在《西游记》文化的滋养下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我们深知，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在当前快速推进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连云港需要在挖掘历史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具有自身独特品格的城市文化。《西游记》所彰显的取经队伍坚持理想、不畏艰险的精神，对今天连云港推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洋溢着丰富大胆的艺术想象的《西游记》文化，对连云港发展自己的城市特色也有深远意义。

《西游记》发祥于连云港，却属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对于这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悉心呵护，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连云港人来说，尤当如此。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两次整理的《西游记》，流行半个多世纪，为《西游记》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该书已有近二十种文字的译本。然而，由于《西游记》珍本大多流失海外，加上受当时技术条件所限，有几个版本国内学术界过去不大容易

看到,所以早期整理时,在版本的使用和文字的取舍上,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为恢复《西游记》的原始面貌,在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原连云港市博物馆馆长、地方志办公室主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长期致力于《西游记》研究的李洪甫教授,与其领导的“《西游记》校勘”项目小组一起,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将金陵世德堂本及其他明刊《西游记》古本,与现今流行的本子逐字比对,撰写了五千多条校记。各地专家学者多次来连云港观摩和研讨,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此次校勘“工作细致、价值极高”。2009年9月,该项成果又得到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正式立项以及基金资助。

修订本《西游记》出版在即,谨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向帮助、扶持这一文化工程的淮海工学院以及各界有识之士,向付出辛勤汗水的“《西游记》校勘”项目小组的同志及相关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谢意。

修订说明

我社的《西游记》，初版于一九五五年，系以明刊本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为底本，参校六种清代刻本整理而成。由于当时新中国成立未久，古籍整理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有关版本不易看到，初版在底本使用、文字校勘等方面难免存在不足。到了一九七九年，我社对此本进行了重新排版，并校订了部分文字，增补了注释，使其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个整理本对于《西游记》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影响巨大，至今仍是市场上最好的版本。

近年来，随着一些稀见版本的渐次刊布，学术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有专家亦指出，我社过去的整理本仍有疏漏之处。对此我们非常重视，一直计划进行修订。

近期，我们得知江苏连云港淮海工学院《西游记》研究所的李洪甫先生领导几位学者组成的项目组，多年来从事《西游记》版本校勘，并对我社过去的整理本与世德堂原本以及李卓吾批评本，做了全面核校，写下了大量校记。我们决定采用他们的校勘成果，对原书重新进行修订。修订过程中，先由李洪甫先生提供他们的全部校勘成果，再由编辑部与其斟酌取舍，最后定稿。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现在，这个新修订本的质量，比原来的整理本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这次修订工作,由李洪甫、周绚隆牵头,参与者有沈海玲、李熙、李思慧、李宏涛、杨华等同仁。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 一 年五月

前 言

—

《西游记》约成书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明代中叶，它和比它先出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后来的《儒林外史》、《红楼梦》，都是我国明清时期最有代表性、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光辉成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熟悉和喜爱的古典文学作品。

《西游记》这部古典小说有它自己的特点，读这部小说，有几点是必须理解的。

第一，《西游记》跟一般古代小说不同，它是一部具有神话、童话性质特点的小说。

毛泽东同志在讲到“神话中的许多变化”、“《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时，曾经指出：“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①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出了神话或童话这类文艺创作具体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的性质和特点,这对我们认识、理解《西游记》这部小说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家知道,“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①神话以及神话小说《西游记》这类作品,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也同样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生活,只不过,它具有自己的特点而已。《水浒传》、《红楼梦》里面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作品里展现的矛盾斗争,除少量属于宗教迷信或文学幻想以外,一般地说,是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当然作品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西游记》里面所描写的孙悟空、猪八戒、玉皇大帝、神仙妖魔,以及孙悟空闹天宫、闯地府、闯龙宫、智斗二郎神、三打白骨精之类的情节,则是现实生活中不曾有过也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西游记》里面写到的那许多出自文学幻想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仍然离不开现实,它们是以作者对社会现实所掌握的见闻材料和对社会生活的感受理解作为创作的基础的。

《西游记》写孙悟空这个神话英雄人物的神通变化,充满浪漫主义的幻想色彩。一个人怎么能够飞天钻地,呼风唤雨,变这变那,甚至能变一座土地庙儿呢?一个筋斗就能翻出十万八千里远,那支金箍棒幌一幌就碗口粗细、数丈长,可是一变又会变得小如绣花针可以放在耳朵里,这是可能的吗?当然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很喜欢这个活泼、机智、乐观,富有斗争精神和无穷本领的人物,连同他那支神奇多变、威力无比的千钧棒。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孙悟空闹天宫、斗妖魔,这些幻想的形式中包含有我们能够理解的现实的内容,具有某种社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会批判的意义,而且这些浪漫主义的描写在作品所展现的艺术世界里是合乎逻辑的。我们读《西游记》时,必须记住它是一部神话小说这样的性质特点,这样才能正确认识这部作品的社会内容和意义。过去悟一子、悟元子之流穿凿附会地把《西游记》说成是“谈禅”(谈论佛理)“释道”(阐释道教)的书^①,后来胡适又把此书说成是“玩世主义”^②,这些都是歪曲、抹煞作品社会内容和意义的错误的评论。

第二,《西游记》跟那些由作家个人创作完成的小说不同,它是古代民众创作和作家创作相结合的成果。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的成书过程跟《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由作家个人写成的情况不同,跟《水浒传》、《三国演义》却有类似之处,其故事都是经过长期的流传和许多人的记述或创作,最后由一位作家作了总结性的再创作而后写定的。

唐僧取经本来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间(公元六二七至六四九年),僧人陈玄奘为了弄清佛经教义,决心到天竺(印度)取经。他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前后花了十七年时间,来往走了几万里路,终于取得六百多部梵文(印度

① 悟一子陈士斌撰《西游记真诠》、悟元子刘一明撰《西游记原旨》,均用佛道思想解释《西游记》的真意。如刘一明在《西游记原旨·读法》中就说《西游记》是“神仙之书”,“乃古今丹经中第一部奇书”,在《西游记原旨序》中又说,读《西游记》的人,“悟之者,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这些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荒谬说法。

② 胡适《西游记考证》说:“这七回(引者按:指《西游记》前七回)的好处全在他的滑稽”,“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他歪曲、抹煞了整部作品积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这跟他对祖国历史文化遗产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是分不开的。

古文字)佛经回到长安。回国以后,他奉旨主持佛经的翻译工作,并口述西行见闻,由他的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介绍西域诸国的佛教遗迹兼及土地出产、风俗人情等状况。后来他的门徒慧立、彦胥又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着重记述他西域取经的详细经历。这两部书虽写真人真事,但因前者是写佛教发源地的见闻,后者是佛教徒的传记,所以都有神异的色彩,《西域记》里面更是记述了许多宗教传闻和佛经里面的故事。又由于在当时交通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唐僧竟能孤身西行、远涉异域,终得取经东还,这件事情本身就带有某种传奇性。这样,唐僧取经故事流传到了民间,就逐渐离开了史实而有了越来越多的神异的内容。

到了宋代,关于取经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说话人甚至已把它作为说话的专题。现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便是南宋时候说话人使用的话本。它已经不像《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那样记述历史人物和事件,而是写猴行者化身为白衣秀士,保护唐僧西行取经,沿途降妖伏怪的故事。这个话本故事情节很粗略,艺术想象力和文字比起吴承恩的《西游记》来差得很远。但它首先把取经故事引入文艺创作,同时又开始把故事的主角由玄奘转为猴行者。书里的猴行者和深沙神,显然就是后来《西游记》里孙悟空和沙和尚这两个形象的前身;猪八戒这个形象则还没有出现。

到了元代,西游取经故事有了很大发展。根据已发现的材料推断,元代至明代初年已经有比《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更为成熟的《西游记》话本小说。可惜我们已见不到当时《西游记》话本的全貌,只在明代永乐年间(公元一四〇三至一四二四年)编纂的《永乐大典》里面,发现有一段题为“魏征梦斩泾河龙”的文字,

约一千二百多字，所引书籍题为《西游记》。这段文字相当于现在世德堂本《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和第十回的前半部分。^①此外，在一部朝鲜古代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曾多次引用到一部题为《唐三藏西游记》的平话。虽然《朴通事谚解》所引述的有关文字并不是那部话本的原文，而是经过转述者简化过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知道那部话本已经写到了有关的许多故事。

西游取经故事很早就在舞台搬演。金院本中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但均已失传。元末明初人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还在。这个剧本有唐僧出世的故事，没有魏征梦斩泾河龙和太宗入冥的故事。孙悟空是此剧的主角，但“神通”远不如后来《西游记》所写的那样，整个形象跟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的形象有本质的区别。

自唐代玄奘取经的历史事件以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这些书籍出现以后，宋、元至明初几百年间关于取经故事的民间口头传说以及话本小说和杂剧，使西游取经故事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文艺形式得到不断的发展。在长期的故事流传过程中，人民群众不断地改造和丰富原有故事的情节内容，同时也把他们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封建社会的观察和认识，对于封建社会里种种丑恶势力的批判和斗争，乃至他们征服自

① 《永乐大典》第一三一九卷保存的那段话本残文，跟吴承恩《西游记》第九、第十回，都写了魏征梦斩泾河龙的故事。除了话本《西游记》里面两个渔翁，在吴本《西游记》里面改为一个渔翁、一个樵子，并且增加了一大段渔樵两人诗词对答之外，两者故事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甚至连卜者袁守诚算定下雨“三尺三寸四十八点”，两书记述也都一样。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表明吴承恩创作时，曾经参考过《永乐大典》所引到的那部《西游记》话本。

然力的理想和愿望注入了取经故事。吴承恩的《西游记》不仅直接继承了有关取经故事的民间文学的题材,而且也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养料,使这部神话小说在生动有趣的艺术描写中常闪烁出可贵的思想光彩。譬如小说第四十五回孙悟空对着一群司雷电风雨之神发号施令:“但看我这棍子:往上一指,就要刮风。”那风婆婆、巽二郎没口的答应道:“就放风!”“棍子第二指,就要布云。”那推云童子、布雾郎君道:“就布云!就布云!”“棍子第三指,就要雷鸣电灼。”那雷公、电母道:“奉承!奉承!”“棍子第四指,就要下雨。”那龙王道:“遵命!遵命!”充分写出了孙悟空在自然之神面前的雄伟气魄和强大威力。这些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古代人民驾驭自然的热烈愿望和人定胜天的乐观精神,这是古代人民“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①的表现。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和作家创作相结合的成果。可以说,没有关于《西游记》的民间文学,就没有吴承恩的《西游记》。当然,前者是比较简单、比较粗糙的东西,在过去这个基础上来一个集大成的再创作,写出一部规模更加巨大、艺术更加成熟、内容更加丰富的古代神话小说,这就是作家吴承恩的贡献了。

第三,吴承恩讽刺、批判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但只是幻想有所改良,并不是要推翻封建统治制度。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他生活在明代中叶,约当公元一五〇〇年至一五八二年;出生在一个由文职小官僚而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曾祖、祖父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两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父亲“卖采缕文郿”(卖彩线和绉纱一类的丝织品)，是个不善经营的小商人，他极好读书，常遭官府吏胥敲诈，对社会现实颇为不满^①。

关于吴承恩，前人有的说他“髫龄即以文鸣于淮”(童年即以文才闻名于淮安一带)^②，有的说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③。从这些记述，我们可以了解吴承恩生平的一些侧面。吴承恩在科举场上很不得志，直到四十多岁才得了个“岁贡生”。由于科场失意，境遇不好，生活贫困，他曾遭到那些势利之徒的笑骂。这种种遭遇使他加深了对封建官场、科场的腐败以及社会上的炎凉世态的认识和愤慨。他为人性格比较倔强，不肯阿谀逢迎^④。直到六十多岁时，不得已，才勉强去作长兴县丞，但不久就“耻折腰(弯腰折背地拜迎官长权贵)，遂拂袖而归”^⑤。他的创作很多，但因贫、老、无子，遗稿很多散失。现存作品除《西游记》外，有后人辑集的《射阳先生存稿》四卷。

吴承恩在科举场上很不得意，对社会现实有所不满，他基本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是实行“王道”“德治”以维护封建制度。这

① 吴承恩：《先府君墓志铭》。作者在文中说：他的曾祖父做过“馮姚训导”，祖父做过“仁和教谕”。父亲是个店肆主人，极好读书，“自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流览”，“又好谈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据《射阳先生存稿》卷三，故宫博物院本。

② 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

③ 《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人物志》。

④ 吴承恩《祭卮山先生文》：“承恩淮海之竖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泥涂困穷，笑骂胥至”。《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诗：“世味由来已备尝”。《赠沙星士》诗：“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见《射阳先生存稿》卷三及卷一。

⑤ 《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人物志》。

从《射阳先生存稿》里面的许多诗文书信可以得到说明^①。譬如该书的第一篇作品《明堂赋》，就是一篇为当朝皇帝歌功颂德的典型作品。他赞美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𡇗）是什么“崇功伟烈”的天子，说他的统治是什么“顺人望，承天心”，“纳黎元于化日（使老百姓生活在和煦的阳光中），合上下于和气”，等等。这当然绝不是当时的现实，只不过是作者幻想明王朝能够实现所谓“王道”“德治”而已。其实朱厚𡇗是一个很昏庸的皇帝，他“崇尚道教”，长年不理朝政，深居宫内，专干那些“服丹药”、求长生之类的蠢事。有些人劝他停止这类迷信活动，竟遭迫害，有的甚至当场被活活打死^②。他又长期让严嵩一伙掌握大权，他们专横跋扈，为所欲为，迫害异己，贪婪昏暴。所以当吴承恩实际地观察现实的时候，他就指出了明代社会的真实状况：“行伍日雕，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面对着官场、科场和一般社会上那些“曲而跽，俯而趋”，“笑语相媚，妒异党同”，“蝇营鼠窥，射利如蛾”的种种丑态，他不禁发出了“近世之风，余不忍详言之也”^③的慨叹。

吴承恩一方面揭露批判当时黑暗丑恶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

① 吴承恩在《开府介川毛公德政颂》并《序》中，提倡“明告戒，振纪纲”，“上务经国，下求宁民，神明在躬，天日可对”的“王道之功”。在《寿师相存斋徐公六十序》中，宣扬“渴贤与善”“求才用人”的“辅相之道”，鼓吹“溯道脉，振儒风”，盼望“唐虞三代之盛，复见于今日”。在《明堂赋序》中甚至说：“歌颂德业，儒臣事也。”这些都是封建文人的老生腐谈，反映了吴承恩思想中封建性的庸俗落后的一面。引文分别见《射阳先生存稿》卷一、卷二。

② 《明史》卷十七《世宗本纪》：“太仆卿杨最谏服丹药，予杖死”；“员外郎刘魁谏营雷殿，予杖下狱”。

③ 分别见《赠卫侯章君履任序》、《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据《射阳先生存稿》卷二。

仍抱着“佞人远，古道还”^①的政治愿望。他在长诗《二郎搜山图歌》中充分地表明了他的社会见解和政治抱负。吴承恩在这首诗里赞美了画家高超的艺术技巧，同时借题发挥，抒写了他对明代社会的看法和自己的理想：“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②诗中“衣冠”指的是官僚士大夫，“猿鹤”和“沙虫”分别比喻高尚之士和卑劣小人，“五鬼”“四凶”分别指宋代和尧舜时期奸恶为害的人物。吴承恩在不少诗文中，反复表达他最憎恨这类人物。他在《熙台先生谏垣奏议跋》中，特别表彰了潘熙台当谏官时，敢于“夺伦、案杲，忤彬、犯宁”，而毛伦、宁杲、江彬、钱宁四人，恰恰是明代的“五鬼”“四凶”式的人物。《二郎搜山图歌》所反映的吴承恩的基本政治观点，就是认为“民灾”之所以形成，社会丑恶现象之所以存在，是由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豺狼当道，权奸误国，所以他想“致麟凤”，行“王道”，维护封建制度的“万年”基业，然而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

作者深感在现实社会中，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对于当时那些“五鬼”“四凶”，“欲起平之恨无力”，于是就在民间传说创

① 《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射阳先生存稿》卷二。

② 《二郎搜山图歌》，见《射阳先生存稿》卷一。诗中“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两句，是作者用历史上的记载、传说，来比喻、揭露明代的政治，说当时明王朝那些当权者是“五鬼”“四凶”那样的恶人。“五鬼”，《宋史》卷二八三《王钦若传》说王钦若、丁谓等五人奸恶为害，时人称为“五鬼”。“四凶”，传说是尧舜时的四个恶人。

作的基础上,创作出《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在民间已经流传的孙悟空这个神话人物身上,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并且借助这个神话英雄手里那支威力无比的金箍棒,来代替自己胸中的“斩邪刀”,对封建社会里那些腐朽黑暗的种种妖魔鬼怪进行扫荡了。这不但表现在小说总的思想倾向上,而且也经常表现在小说的细节描写和人物语言上。如小说四十五回孙悟空布置自然之神布云、打雷、下雨时,特别命令雷公邓天君说:“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赃坏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小说这里写孙悟空最痛恨的是“贪赃坏法之官”,这跟吴承恩本人在许多诗文中所表现的特别仇视贪官污吏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吴承恩正是通过他笔下的主人公孙悟空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的。

吴承恩自幼喜欢野言稗史,熟悉古代神话传说和民间传闻。他曾写了一部志怪小说《禹鼎志》,并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①这告诉我们,他那些志怪小说、神话小说,写的虽是神仙鬼怪,其实他着意的还是在于“人间”。这些创作是幻想的形式,现实的内容,其中是寄寓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评论和批判的。当然,作者这种揭露批判,只是为了改良,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要否定封建社会制度。

二

明代中叶以后,宦官弄权,特务肆虐,政治更加腐败。明武宗朱厚照“暗于用人,昏于行事”,刘瑾等人“奸险佞巧,诬罔恣

^① 吴承恩:《禹鼎志序》,《射阳先生存稿》卷二。

肆”，“大行杀戮，广肆诛求，府藏竭于上，财力匱于下”；刘瑾强索贿赂，“不与则贬斥，与之则迁擢”^①。明世宗朱厚𡇗时，“吏贪官横，民不聊生”^②。严嵩严世蕃父子贪污枉法，“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将弁惟贿嵩，不得不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离”^③。“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④。《西游记》写的虽是神魔故事，但也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现实。

《西游记》相当深刻地揭露、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昏庸凶暴。作品里所描写的天上人间，实际上都没有一块干净的“乐土”。天宫和地府，看上去似乎十分神圣威严，其实是在神圣威严的外衣之下，隐藏着腐败和丑恶。唐太宗魂游地府时，判官崔珏因为生前是“先皇帝驾前之臣”，更因收到当朝宰相魏征的求情信，而他与魏征又是“八拜为交，相知甚厚”（十回），所以就私改生死簿，让唐太宗延年二十，还魂阳世。唐僧师徒历尽千辛万苦，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因为“不曾备得人事”，阿傩、伽叶二尊者便“财作弊”，不肯“白手传经”。为了取得真经，唐僧只得把那只“沿途化斋”的饭碗紫金钵盂都献出去（九十八回）。乌鸡国那个狮狒怪，霸占王位，害死国王，就因为他“官吏情熟”，与神佛阎王有亲，所以乌鸡国王“无门投告”，有冤难伸（三十七回）。这些描写，实际上是当时社会那种官官

① 《明纪》卷二四《武宗纪》（一）。

② 《明纪》卷三六《世宗纪》（九）。

③ 《明纪》卷三四《世宗纪》（七）。

④ 《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一五三王廷相述当时情况云：“文书非贿吏不行，差役以富豪得免”，“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据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相护、徇情枉法、贪赃行贿的黑暗腐败现象的反映。与此同时,《西游记》尽情地嘲弄、批判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荒淫残暴。人间帝王,或崇信道教,或沉迷女色。就连天上的玉帝这个庄严的偶像,在《西游记》里也是一个贤愚莫辨、专横独断的人物。他为了镇压孙悟空的造反行动,在太白金星、太上老君一伙的策划和支持下,设骗局,搞阴谋,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在这些统治者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人间那些昏庸、贪婪、作威作福的封建帝王和臣僚的反动面目。

《西游记》描写取经途中遇到的许多妖魔鬼怪,有的是自然界的险阻和困难的神化,但更多的是象征危害人民的社会恶势力,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如第四十四回写虎力三大仙化为道士,在车迟国以妖术取信国王,迫害和尚,使一国和尚死的死,不死的做苦工、受折磨,欲死不得,欲逃不能,“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而且迫害所及,“就是剪髻、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这正是明代“缉事人四出,道路(路人)惶惧”,“一家犯,邻里皆坐(邻居都受连累)”^①的特务统治的写照。作品关于车迟国王受惑于道士的艺术构思,是有现实的社会根据的。作者生活于明世宗时代,史书记载,明世宗就很崇奉道教,他先后封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为“真人”,官至礼部尚书,他还自号什么“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②。又如四十回写

① 《明史》卷三〇四《刘瑾传》。

② 《明史》卷三〇七《邵元节传》、《陶仲文传》。据《陶仲文传》,嘉靖三十五年,明世宗朱厚赵上皇考道号为什么“大帝”,上皇妣道号为什么“元君”,自取道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其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从这些道号,也可以看出明世宗实在是一个道教迷。